

「從犯罪學理論探討

犯罪防治新對策」研討會

——本中心——

時間：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六月七日上午十時

地點：臺北市松江路三〇六號康華大飯店孔雀廳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社區發展研究訓練中心

出席人員：中央警官學校蔡德輝教授

臺灣大學農業推廣學系廖正宏主任

臺灣大學社會學系丁碧雲、沙依仁、張曉春教授

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李建興主任、林振春助教

政治大學民族社會學系黃維憲教授

中興大學社會學系李鍾元、李瑞金教授

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張隆順教授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徐震教授

中國文化學院社會工作學系蔡漢賢主任

中國文化學院青少年兒童福利學系顧乃羣、楊本亮小姐

中華民國社區發展研究訓練中心白秀雄、王培勳主任，李偉明先生

、洪秀蕊小姐

中央社工會岑士麟先生

臺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馬鎮華主任，觀護人張靜嫻、葉蕊芬小姐、

吳金木先生

基督教兒童福利基金會鄭宏志先生

基督教勵友中心陳俊良先生

「張老師」青少年輔導中心郝溪明小姐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彭永寬先生

臺灣大學社會研究所研究生郭振昌、林萬億、王麗容

壹、專題演講——「從犯罪學理論探討

社區青少年犯罪之防治」

蔡德輝教授（中央警官學校）

我國近年來由於工商業之加速發展及社會型態之急遽變遷，犯罪率已有顯著增加，而且出現諸多新的犯罪形態，尤以青少年犯罪為最嚴重，且令人憂心忡忡，一方面由於不忍國家未來新生一代如此自暴自棄淪落犯罪深淵；另一方面則擔心青少年年輕力壯，智慮未趨成熟，如不及時予以防治，則彼等為非作歹之時日尚久，將對社會安全構成重大威脅。根據統計，少年犯人數約為總犯罪人數的五分之一，而今日之少年犯可能即為明日之成年犯，故如能解決今日之少年犯罪問題，即等於為未來整個犯罪問題解決一大半。然理論乃研究之基礎，而犯罪學之研究，定要根據犯罪學之理論，才有可能去探究。目前我國有關犯罪學理論方面之論述較少，犯罪學理論乃始於十八世紀犯罪學古典學派，至

十九世紀之犯罪學實證學派，才漸成為有系統之科學，且強調運用科學方法研究個別犯罪人及犯罪之原因而給予適當之處遇。廿世紀之後，各國犯罪學家更積極展開犯罪學之理論研究。如奧國的萊滋 (Adolf Lenz) 以犯罪生物學作為研究重點；德國的梅滋格 (E. Mezger) 站在民族與種族二個根本思想建立其犯罪學理論體系；法國塔德 (G. Tarde) 創立犯罪模仿法則；美國齊林 (J.L. Gillin) 發表其犯罪學與刑罰學；波格斯 (E. Burgess) 及特拉西爾 (F. Thrasher) 發表其生態學研究與犯罪地帶；蘇哲蘭 (E.H. Sutherland) 發表其不同接觸理論；涂爾幹 (E. Durkheim) 及梅爾頓 (R.K. Merton) 之無規範理論；柯恩 (A.K. Cohen) 之非行少年次級文化理論；克拉福德 (Cloward) 及奧林 (Ohlin) 之機會理論；雷克利思 (Reckless) 之抑制理論；瑪特扎 (Matza) 之中立化理論；貝克 (Becker) 及李瑪特 (Lemert) 之標籤理論；傑佛利 (C.R. Jeffery) 之生物社會學習理論等對於近代犯罪學理論之發展有巨大之貢獻。上述理論除抑制理論及生物社會學習理論之外，大部分均強調某種因素為犯罪原因而形成各種不同之論斷或學派，然形成犯罪的原因是多元的，犯罪問題之研究已不可再循傳統之方法，從單一學科之觀點去作單方面之探討，而應探討各種犯罪學理論求得犯罪形成之相關因素，並對每一犯罪因素予以深入研究，再採犯罪多元性理論及科際整合性的整體觀及經驗法則的實証研究方法，而對整個犯罪問題予以綜合探討。因此願就有關少年犯罪形成之理論及個人之研究心得，提出一些防治青少年犯罪之管見，以供有關當局及社會人士參考。

一、次級文化理論 (Subcultural Theory) 之探討

美國社會學家柯恩 (Albert Cohen) 等曾提出少年犯次級文化理論 (Delinquent Subcultural Theory) 來說明下層社會之犯罪少年及幫會之形成原因。柯恩認為下層社會之青少年亦渴望達到中上層社會的生活水準，然由於本身種種條件之限制，致其在學校或社會之競爭經常遭到失敗、挫折，然其本

身又無法忍受或妥善處理這種挫敗，乃形成直覺之反應——即產生有別於普通社會之價值觀念以克服其社會適應之困擾，為此而漸認定他不歸屬於普通正常的社會，而歸屬少年犯的一羣團體，並進一步合理化其偏差行為，甚至組成少年幫會，共同以反社會的行為來應付其遭遇的社會適應問題。他們的反社會行為又可分三種形態：第一種幫會是以犯罪手段實現其慾望者，如少年竊盜犯。第二種幫會是喜好滋事打架械鬥之衝突集團。第三種即逃避現實之集團，如吸食強力膠、施打速賜康麻醉藥品者。此外我們亦瞭解犯罪少年通常有下列特徵：(一)只求眼前短暫之享樂而沒有長遠的目標和計劃；(二)對自己所屬的團體盡忠，團結及嚴守幫規，相反地，對別的團體則有漠視或敵對感；(三)他們的反社會或犯罪行為形態經常在變，不像成年犯犯罪的事業化；(四)少年犯的行為經常是有惡意的，非功利的以及反抗社會的行為。

我們瞭解少年犯之價值判斷標準不為我們社會所接受，然却能在其少年幫會同輩團體中適應，有被接受的感覺。而青少年最需要的是友情，青少年朋友之間均是同輩的團體，彼此之間極易溝通，沒有所謂「代溝」存在，因而我們應該運用同輩團體的動力，主動協助他們消除客觀的阻力，為他們剖開不能適應的困擾，使我們從自我形成之「繭結」裏解脫，尋找自我，而將其偏頗的心理導向平衡，以為適應社會正常生活之起步。

1-1、標籤理論 (Labelling Theory) 之探討

近年來美國犯罪學家貝克 (Becker) 及李瑪特 (Lemert) 提出標籤理論 (Labelling Theory)，勸戒家長、老師甚至刑事司法界工作人員，不要隨意為偶而犯錯之小孩加上壞的標籤 (如笨孩子、頑皮蛋、壞孩子、問題少年等)，因為這樣隨意加上的標籤往往成為日後促成小孩陷入更嚴重偏差行為的有力因素。例如：有一小學生在校常惡作劇而遭老師處罰，稍後這位學生如再有粗俗言行而遭老師責備，則部份老師在這種情況之下極易為這類學生罵出「壞孩子」、「頑皮蛋」等外號。當這些學生被套上壞的標籤之後，即會不知不覺地開始修正他們的「自我」印象，並確認他們歸屬這些標籤之角色，導致小孩「自我實現預言」之惡果，然後更進一步用偏差行為來防衛、攻擊及適應週遭環

境對他們初次過失行為反應所引起之問題；因為一旦他們初次過失行為被公開地標籤為偏差行為之後，則他們會真正地按照他們的標籤去扮演其角色並從事偏差行為，為此，我們家長、老師、警察等有關人員對於初次犯錯的小孩，不要隨意責罵，為他們加上壞的標籤，因為這種單純責罵羞辱小孩之反應，不僅無助於小孩行為之改善，反而更陷深他們的偏差行為。

III、增強作用及抑制理論 (Containment Theory) 之探討

每次問題青少年發生，一般人即有一種錯誤觀念，把問題青少年的行為過失，歸咎於他方面，例如家庭把此責任推給學校和社會，而學校却認為是家庭與社會之責任，社會則認為此是家庭與學校疏忽所致，如是家庭、學校與社會各推其責，殊不知除了家庭、學校、社會之外，青少年本身也應該負一部分責任（甚至大部分責任），乃因其問題之發生，常因其自我控制能力薄弱所造成。

犯罪行為之發生，如從心理學觀點解釋，可分三方面：一方面為正面的增強作用 (Positive Reinforcement) 而起，即犯罪人為滿足自己內心之需求和獲得某種報酬的享受，而不知自我控制及循正當途徑取得，如竊盜犯、搶劫犯等。另一方面則為反面的增強作用 (Negative Reinforcement) 而起，某些犯罪人為排除內心一時之痛苦、挫折、焦慮，不知自我控制或用其他適當方法處理而觸犯法網，如某少年因不甘他人之責罵侮辱，乃意氣用事動刀殺人以解除被辱罵內心所引起之痛苦。

此外，美國犯罪學家雷克利斯 (W.C. Reckless) 曾根據外在與內在控制系統而提出控制理論來說明少年犯罪形成之原因：雷氏認為如外在環境有誘發其趨向犯罪之因素時，而青少年本身又無法抑制其內心之欲望，則極易導致犯罪行為之發生。因此預防青少年犯罪之探本追源，應加強青少年之自我觀念、自我控制能力、健全發展之超自我、強烈的責任感，以及願望不能滿足或遭遇失敗挫折時，應如何轉化尋求其他合法之取代和培養高度的自我控制能力。

四、無規範理論 (Anomie Theory) 之探討

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 (E. Durkheim) 認為缺乏規範引導約束的社會生活即是一種無規範 (Anomie)。涂爾幹進一步指出人類一直在追求無法滿足之目標，且其慾望是貪求無厭的，在這種狀態之下，社會如無明確規範加以約束，則這種社會會造成混亂不可忍受之局面。因此無規範產生之問題癥結所在，乃在於社會體系沒有提供清楚的規範 (Norm) 來指導人們之行動，以致人民無所適從而形成無規範產生偏差行為。涂爾幹認為社會的道德行為可歸納為二類：

(1) 規範 (Regulation)：此是指從團體施至個人而言。此規範不是自然的 (Physical) 規範而是道德 (Moral) 的規範。團體的道德規範擴張延伸到個人身上，亦即個人接受團體之規範並身體力行。此正是社會秩序之主要來源和基礎。如果社會的規範不好或不清楚，則會產生無規範 (Anomie)，即一種缺乏規範的社會狀態，亦即社會的無規範狀態；在這種狀態之下會產生諸多偏差行為。

(2) 整合 (Integration)：此是指從個人趨向團體而言。指社會之有秩序主要是由於個人整合到團體之內，亦即捐棄個人本位主義，而主動地趨向社會團體，且接受團體的規範。如果個人的社會整合不好，則個人的自我主義 (Egoism) 盛行，在這種狀態下，社會非常渙散，產生解組現象而發生諸多偏差行為。

此外，涂爾幹認為在經濟不景氣或崩潰之際，社會階層發生階級變動 (Declassification) 之情況，如社會上某些富商因為破產而淪為下階層，此際他們必需減少及約束其需求，並學習作較大之自我控制；反之如他們不能自我控制，又乏清楚之道德教育來指引，則會陷於無法適應之困擾而悶悶不樂，且會有自殺等偏差行為。

由上述可知涂爾幹認為無規範產生的癥結所在，乃由於社會體系無法提供清楚的規範來指導及約束人們之行為，以致人們無所適從，再加上人們自己不能自我約束，而形成社會的無規範狀態而產生偏差行為及社會解組的現象。

五、社區應成立青少年輔導中心之專責

機構

家庭與學校是解決青少年犯罪問題之二大據點，然此二大據點如不能聯繫合作，則亦難達解決此問題之效果，當前我社會除「張老師」及其他少數的青少年輔導活動之外，大部分均靠少年警察隊作預防及輔導工作，然少年警察隊不但業務繁多、人力不足，而且亦較偏重於少年犯罪案件的偵查與犯罪少年的逮捕與移送。因此筆者以為防治青少年犯罪的另一重要工作，乃在各社區成立青少年輔導中心之專責機構，並遴選大學專攻教育、心理、社會學、兒童福利、犯罪防治等之畢業生擔任輔導員，以收青年輔導青年之效，並加強運用社會力量之參與，以補助家庭與學校教育之不足及抵銷家庭與學校教育之孤立和被動性。

六、對初犯輕罪之少年儘量適用社區處遇

犯罪矯治由機構性處遇 (Institutional Treatment) 轉化為社區處遇 (Community-based Treatment)，是現代刑事政策重點之一，亦是刑罰思想演變之結果，已漸為各國所採行之有效的少年犯罪處遇方式。

機構性處遇不但消耗國家較多之公帑，且其環境與一般社會情形迥異，而少年犯社會適應能力本較薄弱，我們如一方面監禁少年犯於圍牆內之特殊社會，另一方面又要期望他們出院(獄)後能適應社會生活，此不僅在達成任務上造成甚大之困難，且有時反而更造成其反社會性或無社會適應性之行爲。許多經驗法則研究之案例顯示：監禁機構對於少年犯施予短期刑之處遇，不但沒有足夠的時間從事積極性之處遇和重建工作，反而有足夠時間使其感染犯罪之惡習，此對一般初犯尤爲顯著。

因此少年犯處遇工作，不必一定使少年犯監禁於少年輔導院、少年監獄等有形之犯罪矯治機構。美國近年來少年犯處遇之新穎作法，乃主張對輕微犯罪之少年改採社區處遇，諸如：中途之家、寄養之家、觀護處分等方式，其目的

在使偶犯輕微犯罪之少年有自新之機會及避免少年進入刑事司法程式及機構性處遇；美國許多實証案例顯示：少年愈早進入刑事司法程序，則其將來繫於刑事司法體系的時間愈久，例如美國一九六三年釋放之人犯，四年後再犯入監之比率亦隨其初犯入監年齡之不同而異：廿歲以下即入監服刑者的再犯比率佔百分之七十；廿歲至廿四歲入監者的再犯率佔百分之六十七；廿五歲至廿九歲入監者之再犯率佔百分之六十五；卅歲至卅九歲入監者之再犯率佔百分之六十一；四十歲至四十九歲者之再犯率佔百分之五十一；五十歲以上入監者的再犯率佔百分之卅八。

此外，社區處遇不僅較合乎人道，且有節省國家公帑之利，同時在減少再犯方面亦比機構性處遇有效。故筆者主張對初犯輕罪之少年犯儘量運用社區處遇代替機構性之處遇，以改變傳統的隔離監禁處遇方式，而期望少年犯仍留在原來社區，運用有關之社區資源予以輔導，增進其適應社會生活能力，而達再教育及再社會化之目的。

少年犯罪問題乃受個人、家庭、學校、文化、社會各方面連環發展和互相影響之錯綜複雜之問題，筆者認為要使青少年犯罪問題減低至最低限度，除上述一些淺見之外，更應運用社區整體力量的參與犯罪防治工作才是最有效辦法。美國學者布克(Burke)曾言：「社會犯罪獲勝之唯一要件，乃促使社會正義之士不出來參與犯罪防治工作。」故防治青少年犯罪已非司法或警察部分工作人員所能勝任，定要靠社會各階層人士結合力量共同參與，協助政府加強犯罪防治工作，因此，唯有警民充分合作，才能一方面使企圖犯罪之青少年無從施其犯罪伎倆；另一方面對於已罹犯罪之青少年，更需社會之支持與協助其心理重建，自立更生。青少年犯罪防治之道不止乎此，筆者謹就上述淺論一、二，就教於先進。

主持人白主任秀雄：

非常感謝蔡教授對青少年犯罪理論作很精闢的介紹，同時也提出很多青少年犯罪防治工作的寶貴經驗，在座諸位都是這方面的專家，請多發表高見。

貳、綜合討論

張隆順教授（輔仁大學社會學系）

本人聆聽蔡教授之演講後，有幾點感想：

1. 深感犯罪防治之重要性，並非只是一單位之事，需要其他社會、心理機構以及學校之配合。
2. 贊成社區處遇方式，但盼蔡教授擬出其可行之辦法，諸如專任輔導員之培養，其工作內容及方法，以及預算呈交決策單位裁奪。
3. 贊成學校老師或家長不可隨意加標籤在小孩身上，以致小孩有自甘墮落之現象。
4. 贊同青少年犯罪原因是因其父母管教太嚴或太鬆所致，建議社區工作多加強未婚及已婚媽媽對教養子女之正確觀念，可藉媽媽教室活動舉行。
5. 應設立觀護人升遷制度，否則觀護人制度無法穩定人事及發展。
6. 建議立法單位能對觀護制度多加了解而使觀護制度有法律依據，以利觀護制度之發展。
7. 各學校相關科系最好能開有關觀護之課程讓學生們選修，以便幫助學生做好工作前之準備。
8. 應協助青少年對生活有正確的觀念及良好的生活習慣。
9. 蔡教授曾提到在社區內設置社區工作人員以預防青少年犯罪，請問其工作內容及工作方法為何？

主講人蔡德輝教授答覆：

一般少年犯的家庭，大抵是父親過分嚴格，母親過分溺愛，所以社區工作人員第一階段的工作就是改變社區內家長對孩子的管教方法。其次，社區的小孩發生困難時，不知道向社會上一些慈善或救助諮詢機構如張老師、熊大姊……等求救，社區工作人員可以指導青少年向這些機構求得幫助。另外也可利用寒暑

假在社區內舉辦各項活動，指導社區青少年從事有益身心的活動。至於工作推展方法，大抵可以分為下列幾種：

1. 遴選大專有關科系學生擔任社區輔導員。
2. 指導青少年活動，寓教育於活動之中，誘導學生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及社會價值觀念。
3. 常於社區內舉辦各項競賽，加強社區間青少年之友誼及團隊精神。
4. 指導並鼓勵青少年讀書明理，並疏導其情緒。
5. 輔導青少年協助社區發展工作，鼓勵並組織青少年參與社區發展，並成為社區志願工作者。
6. 邀請問題青少年之家長參加座談，以溝通其教育子女的方法與態度，俾使家庭教育與社區輔導相配合。
7. 對於特殊問題之青少年採個別訪談，與其建立良好關係，然後探討其問題，解決其問題。
8. 對於學校生活不適應或對學業有困難者，則可協助其尋求問題的原因，幫助他解決問題，或聯繫教育單位給予輔導，以建立家庭——學校——社區三者的串連關係。
9. 對於失業青少年，則儘量協助其參加國民就業輔導訓練，以謀一技之長，並自立謀生於社會。

黃維憲教授（政治大學民族社會學系）

策。

1. 先做犯罪地帶的研究，然後才能針對犯罪地區的特性，設計犯罪防治對策。
2. 犯罪次文化的概念有待進一步的定義，因次文化包含甚廣，有犯罪次文化、搶劫次文化、青少年次文化……如果對這些能分辨其差異，對於犯罪防治將更有貢獻。
3. 機會結構理論與犯罪次文化理論之間，若透過區位生態犯罪區域之研究，更能够瞭解犯罪行為的形成和產生。

4. 標籤理論除剛才所提之初級偏差 (Primary Deviance) 和次級偏差 (Secondary Deviance) 以外，另有貝克所提之自我標籤和社會標籤：自我標籤即所謂的自我實現預言 (Self-fulfilling Prophecy)；社會標籤即社會大眾對犯罪者之一種看法。

5. 談犯罪行為的預防，必須從加強研究工作着手，如果能够研究出一套確實有效的行為改變技術，對犯罪處遇或預防都將有重大幫助。

6. 目前很多人談經濟性犯罪，其實經濟犯罪也可從犯罪理論來做研究。在犯罪學裏面稱經濟犯罪為白領犯罪，相對於青少年犯罪，而其性質與剛才所探討的一樣，仍然可以從文化理論、不同接觸理論、標籤理論來探討。現在很多人從經濟或刑罰立場來談經濟性犯罪，其實經濟性犯罪在本質上仍屬於犯罪行為，是一種多科際之研究工作，現在沒有發現有犯罪學家或社會學家參與這個工作，這是我們應加以納入的探討領域，希望各位能共同合力來參與這個工作。

主講人蔡德輝教授答覆：

我們無法以一個理論來解釋所有的犯罪問題，相反的，一個犯罪行為需要有許多不同的犯罪理論綜合來探討。方才我在介紹蘇格蘭的不同接觸理論後，曾經介紹斯肯納的社會學習理論。其實最新的犯罪學理論是一九七七年美國犯罪學家傑佛利 (Biosocial Jeffery) 提出來的生物社會學習理論 (Biosocial Learning Theory)，他的公式是 $G \times E = O$ ， $O \times E = B$ ， G 是遺傳因子 (Gene)， E 是環境 (Environment)， O 是生物有機體 (Organism)， B 是行為 (Behavior)，這是較屬於科技整合性的一個理論，也是將來犯罪學研究的新趨向。

徐震教授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1. 目前臺灣地區在推展社區發展工作法上有顯著的偏差，即社會機構在推

展社區發展工作時，過分認為社區發展工作是社會行政工作或社會福利工作，而忽略了與司法、警察、衛生單位之配合，以致難以達到整合性的發展。

2. 臺灣所推行的社區發展與社區理事會所劃定的社區範圍太小，只包括一個里或兩個里，因之，其資源機構不足以推展社區工作，社區本身無法負擔青少年活動指導工作的推展。

3. 社會處與社會局認為社區發展是本身的工作，而其他衛生、建設、司法、警察單位也就認為社區發展是社會處的工作。今天難得有蔡教授提出社區處遇對犯罪預防是較有貢獻的，社區照顧較機構照顧更有效。若能把這一點發現透過社工同仁使政府有關單位瞭解，當是國家社會之福。特建議蔡教授能夠與社區發展中心繼續將社區處遇具體化，也希望司法警察單位能瞭解到社區發展對少年犯罪防治的功効，大家共同來從事這方面的預防矯治工作，也使得大家對社區發展工作有一更為正確的認識。

沙依仁教授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1. 蔡教授所倡導的少年犯社區處理的辦法非常有價值，目前我國所籌劃的社區範圍太小，最好能擴大至以區或鄉為單位實施此辦法。

2. 本人因指導臺大學生實習，常赴國中及國小，發現目前的國民教育因學生越區就讀，往往一校混合無數社區的學生，甚至有住在他縣市的學生。而住在犯罪率高的社區的學生往往將不良的價值及行為傳遞到學校，因此將來從事生態研究的學者請注意到這種因素。

3. 關於標籤理論，少數教師對待學生的管教係傳統式嚴格壓制的辦法，不是愛的教育。將成績落後的學生標籤為壞學生，最易造成少年們的反感，因此減低了學習動機，改變了自我概念，或者加入不良幫派，有反社會的意識，逐漸形成了犯罪行為。

4. 關於教育方面及社會風氣方面，有時學校的某些措施鼓勵了，甚至教導學生不誠實、虛偽等，使學生不能明辨是非及正當或不正當的行為，因此容易犯罪。再者，社會上對白領階級的犯罪往往不加注意或深究，如此易使社會風

氣不良，犯罪率提高。今後似應多注意白領階級的犯罪。

主講人蔡德輝教授答覆：

剛才黃教授與沙教授都提到「白領犯罪」，使我想起美國一位經常出入監獄的犯罪者所說的話：「法律就像蜘蛛網，只能網住蒼蠅、蚊子，而任大黃蜂橫衝直撞。」中上階層是大黃蜂，下階層是小蚊子，其實中上階層的犯罪比下階層的還多，今後，我們應該多注意中上階層的犯罪問題。

馬鎮華主任（台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

1. 感謝蔡教授對觀護工作的宣揚，給我們莫大鼓勵。
2. 觀護工作對犯罪預防和犯罪矯治方面具有重大意義，目前我國之觀護工作雖有一點小成效，可惜未能發揮其預期的效果。
3. 我們對青少年的輔導就如同醫生診斷病人一樣，診斷後再給予處方，然而今天的醫師是推事，他能決定處方，可是他却沒有診斷，他着重在犯罪行為的有無與輕重，而非行為發生的原因及處理的方法，他首先考慮到的是法令如何規定，由於受制於法令規定，而造成今天觀護工作的困難與缺陷。
4. 如果所有青少年案件均由觀護人處理，可以避免標籤的影響。經過觀護人員處理，案情輕者可以不必進法庭，重者經觀護人觀察研究診斷出其原因，可以作為處置的重要依據，然而今天青少年案件必須經過裁判，交付保護管束，交付假釋或輔導，觀護人才來處理這件事情。這就如同小孩生病，我們診斷其為感冒發燒，但是却不能給他吃藥，必須經過三、五個月後再給他吃藥。所以，我國目前的觀護工作需要好好加以改變。

5. 觀護工作自五十七年起開始在我國推展，但是成效緩慢，主要由於司法界在觀念上無法立刻接受這些新的東西。因之，保護管束人數眾多，而觀護人

員稀少；反之，少年輔育院人數不多，而工作人員及經費反而加多。政府之重點似乎仍採隔離矯治，方才蔡教授所提之社區處遇有其重大意義，因此，個人認為觀護工作獨立及壯大應是我們今後的重點工作。

6. 犯罪預防應與社區發展工作密切配合，六十七年時，我們在木柵區從事區域防治工作，綜合各方面的力量成立「木柵區少年犯罪防治工作會報」，工作分為兩種，一為問題青少年之輔導，一為正常青少年的表揚與獎勵，然而並不明顯區分為問題青少年和正常青少年，以避免標籤影響。其結果是六十七年在臺北市警察局舉辦的六項競賽中，木柵區得到四個冠軍；犯罪案件降低、少年犯罪率降低、破案率提高……。但是，景美、新店地區犯罪率提高了。故這種工作也是需要大家聯合一起來做，才更有實效。

7. 觀護工作的成效，可從受保護管束執行完畢之少年再犯的比例得知：民國六十六年是百分之六；六十七年是百分之五；六十八年是百分之四點八六。其比例年年下降，可知觀護工作是有其成效的。

8. 將來司法行政部改為法務部之後，在其下成立一個司，稱為「保護司」，主管更生保護與犯罪預防，相信以後的更生保護工作定能發揮效用。

岑士麟教授（中央社工會）

1. 目前的觀護工作由司法單位負責是不恰當的，在全面建立社會工作專業化的今天，觀護工作應該由社會工作人員來擔任。現在我們請社會上有聲望或慈善人士來做觀護工作，是否有成效，實在值得懷疑。因為從事觀護工作必須具備專業知識，而對這些人士舉辦講習，他們是否有空參加，實在難以預測，所以要做好觀護工作，應由建立社會工作專業化並納觀護工作於社會工作的領域之內，由社會工作人員來執行，才能發揮具體的效果。

2. 社區青少年犯罪防治工作是社區發展工作綱要的工作項目之一，却没有

規劃出施行的方法。

3. 目前更生保護工作有名無實，各位從電視上可以看到少年輔育院的青少年參加技能檢定，每個人都百分之百及格，足見他們在少年輔育院都已學得一技之長，但是，我們却沒看到有那個社政單位在他們出院之後，予以妥善照顧，迫使他們再度走上犯罪之途。

郭東暉會長（基督教兒童福利基金會）書面意見：

1. 父親在獄經本會協助後，出獄自立之統計：二七一人，佔〇・九八%；同時安家與表現社會溫暖，經常使父親安心在獄，並努力追求悔改；又輔導通信，使父親與子女間建立第二度之親情。

2. 協助兒童、國中、高職畢業學生就職自立統計：九九六八八，佔三五・八九%。許多學生因家庭變故無法繳納學費，以致輟學而走入歧途，均經本會輔導復學、補助費用而完成學業，可說是逃過了問題少年的關卡。

3. 觀護所的兒童問題：許多進入觀護所復出之後，並無改善，很快因重犯而再度進所，其問題在於缺少問題發生的檢討與預防，故應設社會工作員到家訪視，了解問題之由來，給予家庭補助與輔導，以求問題之全盤解決，如家庭父母無法盡職或家庭生活困苦無法供其上學，或住屋臥室太擠無法安臥。

4. 以下就本會臺北中心的一個實例提出討論——

問題：母盲，姿色中上，育有二子，一為十二歲，一為八歲。多次要求

工作員協助輔導其十二歲兒子不該於晚上外出並整夜不歸。

診斷：經與其十二歲長子面談後，發現該少年性情溫順，夜不歸並非在外作壞事或結交不良少年，乃因家中臥室僅三個榻榻米大，他說不好睡，睡不著才外出。但可能不只睡三個人吧！否則怎會太擠？經詢問鄰人，才知其母半夜經常在家接客，以致長子不堪入目

，又無法成眠而外出。

治療：①母與子女分床。

②不可在家接客。

5. 所以，觀護所應有社會工作員實地了解犯罪原因，然後處方醫治。

林萬億先生（台大社研所研究生）書面意見：

社區處遇的青少年犯罪預防與矯治工作，在理論上是有其價值的，而且在國外也有實證資料支持。但是，在充分運用社區工作方法上，國內的可行性值得做更廣泛的研究，如現行社區工作人員的工作方法、工作負荷、工作環境，以及來自政策的支持等，都有待檢討，否則加上這一環，工作更是繁重無比。個人以為應先針對下列三點進行試探：

1. 對國內可做為社區處遇的區位基礎進行評估，是否目前的社區範圍可以行之。

2. 對目前社區發展工作方法、政策目標，以及社區工作人員制度做檢討，以免負荷不了良法美意。

3. 對已有志願工作人員（或團隊）和有設置社區工作人員的社區進行評估其是否有效，如此更能找出社區處遇的可行方法。

如此，則一套可行的社區處遇方法將更落實而持久。

郭振昌先生（台大社研所研究生）書面意見：

今天討論的重點在於犯罪防治新對策——社區處遇。我個人覺得根本上還是需要從思想觀念、意識型態、價值取向建立起，亦即「社區的接受」做起，這就有待社區宣導與教育的成功。「社區報紙」必須發揮其應有的功能，大家都有這種認識後，羣策羣力，以社區發展方式來防治犯罪，始能奏其功效。